

贵州现代经济史

第一卷(1949—1965)

主编:石 争 刘凤翔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韦仕杰

封面设计 孟志钢

书 名 贵州现代经济史
主 编 石 争 刘凤翔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550002)
印 刷 贵州新华激光照排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mm 1/32 13.5 印张 283 千字
版 次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7—221—03469—7/F·121
定 价 8.50 元

本书受贵州省 1994 年
度出版基金资助

主 编:石 争

刘凤翔

副 主 编:熊大宽

王干梅

谢 一

郭亨隆

编写组成员:杨传柱

戴志强

刘庆和

韩 义

刘益群

徐 静

周德芳

战玉琴

绪 论

关于修史,自古以来,在中国这块延续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土地上,当代人写当代史都是一件难事,因而许多史学家对此不敢问津。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结束了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剥削社会制度,在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但若真正秉笔直书当代史仍然会有一些障碍,作者往往也心有余悸。我们这几个人虽然是科研专业人员,然而“杯弓蛇影”的遗痕,也不可能对我们没有一星半点的影响。说句老实话,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方法论,重新确立了“生产力标准”的历史地位,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使解放思想的浪潮一波高过一波,改革的进程一层深过一层,对外开放领域也从经济领域逐步向着全方位开放拓宽,我们写《贵州现代经济史》第一卷的意愿恐怕也难以实现。尽管如此,由于我们长期受着那套“左”的理论框框的束缚,生活在产品经济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年代里很久,所以本身的解放思想也是有局限性的,因而对这段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评价也就不易做到科学、正确,甚至会“老调新唱”,不能作出规律性的概括和描绘。不过,我们研究和写作过程中都十分警惕这个问题。从总体上说我们还是把

握了修史应遵循的原则的。

《贵州现代经济史》第一卷共分四编，十九章。第一编含五章，是论述从1949年11月到1992年底这个时期。这个时期虽然从经济的角度概括为“经济恢复时期”，但事实上这是全国包括贵州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的伟大革命阶段。在这一时期，贵州首先进行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镇压反革命”的五大任务，接着先后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实行了耕者有其田，使广大农民经济上、政治上都翻身作了主人。占全省人口总数90%多的农民这种经济上、政治上的地位改变，不但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一次解放，为已经崩溃的经济恢复带来了生机和活力，而且也就为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开拓了道路。标志这种趋势的主要因素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和土地改革后的广大农民已建立起了崭新的工农联盟，他们都从内心深处萌发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和对社会主义向往。与农村民主改革的同时，在城市不但完成了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的工作，为发展全民所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初创了基础，而且，还通过反对贪污、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加强了新政权的巩固和建设，通过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行贿受贿、反对盗窃经济情报和反对投机倒把的“五反”运动保证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贯彻执行。由此可见，解放后的三年经济恢复时期，是与全面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建立国营经济的伟大历史任务交织进行的，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谁都知道，如果不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不消灭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和其他劳

动人民不能成为国家的主人，劳动者仍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奴隶地位，不实行生产力的大解放，决不会那么快就把满目疮痍、民生凋蔽的经济恢复过来，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因此，在总结这段经济发展的历史的时候，看不到革命解放生产力的作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行施其职能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的作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作用，就不可能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和科学的结论。

《贵州现代经济史》第一卷中的第二编共含五章。这一编是论述从1953年到1957年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一五”时期。开天辟地以来，在中国第一次实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不但是一个新事物、新问题，需要边探索边实践，同时还要完成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大变革，因而“一五”时期的经济建设是在完成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一伟大革命的过程中进行的。所以，不论全国还是贵州，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首要任务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生产关系，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本来按照国家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要求，要用10年1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才完成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事实却出人意料的快，贵州和全国都在1956年下半年就基本完成了农业、手工业的合作社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完成了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变革，至此，在中国也包括贵州这个多民族共居的省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胜利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在贵州农村，已全部

实现了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高级农业全作化,1957年参加高级合作社农户占了农户总数的97%,从事手工业人员1957年参加合作组织的达到了95.7%,资本主义工商业到1957年已分别加入了各种形式的公私合营。这场社会主义革命的大变革,虽然步伐过快,各阶层各界人士都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各级党委各级政府也都缺乏必要的政策准备和组织准备,但由于民主革命的胜利给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乃至民族资产阶级带来的实惠和无比喜悦,共产党人无畏的民族自豪和无私奉献的精神的强烈感召,向往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望的驱动力,这些因素形成一种综合力量,加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比预计的时间缩短了2/3甚至3/4。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革命总是起着解放生产力的作用的,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势所必然的历史发展大趋势,因此,尽管进程太快,留下的后遗症颇多,但没有在总体上妨碍它发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种作用,全国的和贵州的第一个国民经济建设计划就不会完成得那么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好时期之一。单就工农业生产总值的变化,就可令国人倾倒,使世界瞩目。工农业总产值1953——1957年始终是持续增长,逐年递增。贵州以1957年与1952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64.6%,每年平均增长12.92%;工业总产值增长125.2%,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9.9%。贵州这个历史上就以贫穷著称的地方,昔日那种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景象已彻底改观,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空前的提高。面对着一年好过一年的变化,全省上下、各族人民都已形成了一种牢固的信念,只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未来的前景会像芝麻开花——节节高。的确客观事实不

容人们置疑，“一五”时期的贵州的经济建设成就是巨大的，社会主义的种子开了花、结了果，它的优越性不但让人们看得见，而且摸得着，从而深深扎下了根。

《贵州现代经济史》第一卷第三编，共含五章，论述的是1958——1960年这一时期。通常把这一时期叫做“大跃进”时期。“大跃进”是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驱动下出现的。总路线的公布吹响了贵州大跃进的号角，经济工作开始跨入了全面急躁冒进的格局，诸如所谓实现“全面大跃进”，“三年改变面貌”等乌托邦式的口号把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引入了歧途。特别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像一阵不堪抵挡的暴风雨，把本来就不牢固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化又无端地拔苗助长为人民公社，违背客观规律的生产关系变革，不但不能起到解放生产力的作用，而且严重伤害了作为生产力中决定因素的人的积极性。与人民公社相伴而来的大炼钢铁和公共食堂，更把“左”的错误推向登峰造极的程度。大炼钢铁的盲目性简直达到了疯狂的境地，不讲科学，不讲可能性，不问有无铁矿，不管代价如何之大，结果招致了无法弥补的严重后果。第一，森林大量被砍伐，导致若干年内不能恢复自然生态平衡；第二，以钢为纲的错误方针，破坏了整个农业生产和全部经济工作，粮食大幅度减产，其他物资也异常短缺，甚至造成了严重的人的非正常死亡；第三，“一五”时期刚刚在全省人民中树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好”那快丰碑，被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这场灾难性的运动罩上了一片黑影，大大减弱了这条金光大道的光辉。如果说大炼钢铁主要是违背自然规律而盲动蛮干达到至极而无以复加的一种典型事件，普遍兴办“吃饭不要钱的共公食堂”则是物质利益分配领

域中奉行平均主义达到极端的典型。与此产生连锁反应的则是“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公社之间、管理区之间、大队之间、生产队之间平调劳动力、平调物资、平调资金的现象曾大量发生，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使劳动者之间的物质利益的矛盾激化，消极怠工的态度成了抵制平均主义的普遍现象，从而直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大跃进”的3年岁月，实际上是经济上的大倒退，人民生活的大降低，社会主义光辉的大减弱，是中国在错误路线下经受了一场大灾难的时期。从全局看，在党的极“左”路线的迫使下，贵州也与全国一样，是在灾难中渡过的，“一五”时期刚刚初创而本来仍很薄弱的经济基础，经过3年的折腾，就更加步履艰难了。尤其是由于粮食生产下降而导致的缺粮断炊，劳动者身体出现了严重衰弱，甚至城乡均有一定数量的人非正常死亡发生，贵州一度沉陷于悲惨景象之中。所幸中国共产党毕竟是英明、伟大的，1960年下半年作出了整风整社的决定，通过整风整社逐步纠正那些错误的政策措施，从而使中国走上了摆脱“大跃进”的灾难的新里程，迎来了其后5年所进行的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与恢复，希望之光又照亮了中国大地和贵州这个角落。

《贵州现代经济史》第一卷第四编，共含四章，是论述1961—1965年这一时期。这是结束大跃进那段令人可悲的日子，使中国回到比较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来的一段重要历史。在这5年当中，按照中共中央制定的“整顿、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当时可以说采取了继然措施，毫不犹豫地大力压缩了基本建设战线，全面整顿和调整了工业企业，对各经济部门的投资比例进行了适当调整，大量动员城镇人口转到农村。在这期间一个重大而

重要的举措,是开展了对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认真纠正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解散了共公食堂,缩小了基本核算单位的规模,加强了经营管理,开展了多种经营,加之恢复了农村集市贸易,使本已岌岌可危的人民公社又在一定程度上复苏了它的生机和活力。到了1962年,贵州的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好转,粮食总产量达到73.1亿斤,已接近1953年的总产量。在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的贵州,粮食更是“宝中之宝”,有了保证全省人民生活必需的粮食,“民以食为天”的关键问题就基本得到了解决。人民需要的许多副食品大多也是粮食转化的,随着粮食生产的不断发展,肉蛋禽类的产量也在逐年增加,到1965年,贵州城乡人民的吃肉、吃油问题已经得到了相应的解决,全省范围内呈现了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如果不是1963年以后在农村又普遍开展了极“左”的“四清”运动,提出了党内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到空前的高度,挫伤了广大干部尤其是农村干部的积极性,甚至事实上“四清”运动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可能更快更好。今天我们来论述贵州经济建设这段历史,不能不感到惋惜与遗憾。

前面我们论述了贵州1949—1965年这15年的经济建设,我们把它叫做《贵州现代经济史》第一卷。这里言下之意很显然,我们期望陆续写出第二卷、第三卷乃至若干卷,以求对贵州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各个时期都能作出科学的总结与公正的评价,让后人特别是一代一代居于决策地位的人士借鉴。对人类历史的科学总结与公正评价,对后人来说它的确是应当借鉴的镜子,只要虔诚以求,是会得到益处的。我们从这

次修著这段贵州现代经济史第一卷的过程中,也颇受教益,感触良多。纵观那15年的岁月,有过解放初期经济恢复的成功,有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济建设的巨大胜利,有过1958年以后大跃进那样的历史性失误,有过1961——1965年卓有成效的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发展。面对着这段既复杂又曲折,既有成功,又有失败;既有欢乐,又有悲伤;既有正确,又有错误;既有经验,又有教训的历史画面,只要不僵化顽固,都不会把它看成一笔糊涂帐。我们几个写作者当中,既有年过花甲是当年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也有血气方刚的后起之秀,因而我们从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上对这段历史由多方面进行了反思与总结。第一,贵州在那些年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其基本原因可归纳为两条:一条是自觉地把劲头用在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上,从而就给广大人民带来了实惠。比如在解放初期的经济恢复和土地改革中,对保护和发展工商业和抓好农业生产始终是坚定不移的。正因如此,到1952年,贵州的工农业总产值就比1949年增长了19.7%,粮食总产量增长了16.2%。在“一五”时期,贵州于1953年完成土地改革后,直到1957年底,整个农村是以发展生产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在那段时间内,阶级斗争的浪潮,随着土地改革的结束已逐渐趋向缓和状态,所以贵州经济得到了持续稳定的发展;1954年比1953年工农总产值增长了8.43%,1955年又比1954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7.64%,1956年又比1955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3.2%,1957年又比1956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9.5%;粮食的总产量到1957年突破历史纪录,达到107.12亿斤。另一条基本原因,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状态比较协调。1956年以前,贵州的农村主要是按照“等价交换,自愿互利”的原则,发展并不触动

主要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的互助组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而且允许农民入社退社完全自由。因此,那时这种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合乎客观实际与农民的心愿的,可以说大体上是体现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的。1956年下半年掀起的高级农业合作化的高潮,由于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分配中平均主义的萌发,就破坏了农村生产关系的良好组合。虽然1956年贵州仍坚持了以原来的初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分配,相对说减弱了分配中“一平二调”的成份,继续获得了1957年的粮食大丰收,但当1957年冬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布以后,紧接着“大跃进”的号角越吹越响,贵州农村生产关系的发展就彻底离开正常的轨道。从此,贵州就同全国一样开始了那段疯狂的“大跃进”灾难年代。

我们在反思和总结中感受最深的第二个问题,是要永远记住值得引以为戒的几个理论上的经验教训。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有了正确的理论导向,实践才易于正确,否则理论的荒谬必然导致实践的错误,为人民招致灾难。理论上重大的错误可概括为几个:一是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以唯心主义的意志取代了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这就是任意拔高生产关系,提出“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严重背离客观规律,脱离国情省情的根由。二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缺乏科学的理论认识,当时在事实上忘掉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条件的,社会主义的发展直至过渡到共产主义,都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因而许多重大决策的失误都同离开生产力标准有直接关系。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急于过渡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紧接着又一声令下在全国实现人民公社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还有后来提出的“穷过渡”,

这些不堪回首的失误,无一不与离开生产力标准密切相关。三是错误地以平均主义取代了“按劳分配”,扭曲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似乎平均主义越严重,共产主义因素就越大。积重难返的吃“大锅饭”格局的形成,包干到户前农民离心倾向的严重出现,都可以说是长期奉行平均主义的恶果。平均主义危害之大,毒素之深,至今仍对发展商品经营和全面改革产生着不利的影响。四是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因而就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产品经济格局而不能自拔,使生产力的发展失去了应有的生机和活力。五是把单一的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唯一模式。实践证明,这种单一的所有制模式,只能妨害生产力的发展,限制劳动者的积极性,阻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前面所列举的几个理论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三次代表会上已经澄清,人们的认识已经得到端正。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就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然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能够记住历史上理论导向错误的遗憾,也绝对不会是多余的。

我们在反思和总结中还联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地区的能动作用。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一个中等省区的人口都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因此,地区在经济建设中的能动作用相当重要。从大量的有关这段经济建设的史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过去那些年代的经济活动中,由于地区(不论是一个地、州或一个县)在各自的具体决策中所体现的主观能动作用不同,产生的后果也往往存在着很大差别。比如,在粮食问题上就是如此。1957年后,当时因为生产上的瞎指挥,加上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浮夸风又吹得天昏地暗,在这种容易使人头脑发昏

的时刻,有些地、县能实事求是,不赶风头,工作踏实,相对说那里生产、生活都要好一些。可是相反,有些地区对浮夸风的危害认识不清,随波逐流,闻风而动,甚至不惜弄虚作假,把生产和生活的实际状况都掩盖起来,报喜不报忧,以致导致了人的非正常死亡,形成沉痛的血的教训。当然,在经过十年浩劫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可以断定再犯历史上那种不可思议的错误是不大可能的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市场机制作用的强化,地区作为或大或小的利益主体,相互之间竞争则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竞争的胜败仍将决定于决策是否科学、正确。因此,作为一个地区,无论是战略性宏观决策,还是各式各样的微观决策,都应当实行科学决策,力求所作出的决策符合本地区的客观实际,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具有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和可操作性,才能够在市场经济中赢得竞争的胜利。我们从来认定贵州是隐藏着发展经济巨大潜力的,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宝地,人民是质朴勤劳的,只要决策科学、正确,就一定能够最终展翅高飞,实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关于贵州“后来居上”的预言。

目 录

绪 论

第一编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

第一章 解放前贵州经济概述	(2)
第一节 濒临破产的农村经济	(2)
第二节 薄弱的城镇工业	(5)
第三节 极不发达的商业	(8)
第四节 落后的交通运输、邮电业	(10)
第五节 劳动人民生活困苦	(11)
第二章 稳定经济秩序,克服经济困难的斗争	(14)
第一节 贵州解放初期的经济形势	(14)
第二节 稳定经济秩序的斗争	(22)
第三节 调整工商业	(35)
第四节 平衡财政收支,活跃城乡经济	(44)
第三章 农村生产关系的初步变革	(55)
第一节 减租退押	(55)
第二节 土地改革运动	(58)
第三节 农业互助合作	(65)
第四章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71)
第一节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71)
第二节 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74)
第三节 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80)
第四节 交通、邮电业的恢复和发展	(86)

第五章	恢复时期任务的胜利完成及主要经验	(93)
第一节	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	(93)
第二节	国民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99)
第三节	恢复时期工作的主要经验	(101)
第二编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	
第六章	宣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08)
第一节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应运而生	(108)
第二节	一场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教育	(110)
第三节	贵州人民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	(111)
第七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和执行	(115)
第一节	制订五年计划是经济建设的客观需要	(115)
第二节	五年计划的基本内容	(117)
第三节	“一五”计划编制中遇到的几个问题	(131)
第四节	“一五”计划执行情况	(134)
第八章	粮、油、棉实行统购统销	(142)
第一节	保证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措施	(142)
第二节	实行粮、油、棉统购统销的重要政策	(145)
第三节	实行统购统销的步骤与作法	(153)
第四节	统购统销的成效和问题	(157)
第九章	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	(164)
第一节	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64)
第二节	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78)
第三节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87)
第十章	“一五”时期的基本总结	(200)
第一节	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	(200)
第二节	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评价	(202)
第三节	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评价	(205)
第三编	大跃进时期(1958——1960)	